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梁启超 新史学的当代解读



宋学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40812

B259.1
29

梁启超 新史学的当代解读



宋学勤◎著



北航

C17280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259.1
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 / 宋学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61 - 2490 - 1

I. ①梁… II. ①宋… III. ①梁启超 (1873 ~ 1929) — 史学 — 思想评论 IV. ①B259. 1②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78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刘 倩
责任校对 秦 艳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7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其泰

一个学者，具有天生的聪慧和渊博的学识，同时勤奋过人，数十年如一日，以惊人的毅力披阅典籍、发愤写作，一生完成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著作，涉及社会问题和诸多的学术领域，其精神和成就，是很值得钦佩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时光的流逝没有冲淡他的光彩，百年之后，他的论著仍被一版再版，广受欢迎，而当人们打开新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刊物时，会发现引用其言论者难以尽数，历年来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有许多人以研究其学术思想为题目，选取的角度包括史学、文献学、哲学、文学、经济、财政、法律、宗教等，其影响力堪称历久而弥新，同时代学人罕有其匹，这就更证明他的论著和思想在近代文化史上建树了一座丰碑！

他就是梁启超，20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史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29年，梁启超逝世之时，黄炎培即撰文说：“戊戌迄今三十年来，自士大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为能摄取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晚岁指示人以科学方法治国学之途径……要之，近世纪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远，谁则如之？”郭沫若则在《少年时代》中回忆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这两段话，深刻而中肯地对梁氏的思想、造诣、学术成就和巨大的影响作出的恰当的评价，代表

了人们的共识。若要补充最新的例证,则平日留心阅读的人不难从报纸杂志中随手找到,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有学者撰文指出,梁启超是辛亥革命发生前夜最为准确地预言清王朝将迅速垮台、将来词典上也绝无“宣统三年”的人物。另有一篇论述20世纪中国长篇传记发生发展历程的文章指出,中国长篇传记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正是与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密切相关的,梁氏本人撰写的《王荆公评传》就是中国长篇传记肇始之作。还有一本在2011年底出版的纪念钱穆的书,认为激发钱穆之志研究历史的原因,是他在16岁时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的希望和国民责任》后,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因而发愿要在研治历史中寻找中国不亡的原因。

以上引录的两段评论和报刊文章提供的信息有力地证明: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过了一个世纪以后人们阅读他的论著,仍然能不断获得新的领悟、新的启迪。毫无疑问,这是文化史上极为宝贵和极为重要的现象,研究者有责任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总结。这样做,不但是进一步剖析、评价梁启超学术的需要,更是科学地阐述20世纪学术思潮和文化走向的需要,而且对于启发当前人们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和更鲜明时代特征的学术成果很有现实意义。宋学勤博士付出极大心力撰成的专著《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恰恰符合这一时代要求。作者选题新颖,立意很高,明显地要站在21世纪的高度,对于梁启超学术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作新的探讨,提供自己的答案。作者目光敏锐,研究思路清晰,书中重点论述的都是很关键的问题,包括: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救亡图存思潮高涨对梁氏的影响和推动,梁氏倡导思想启蒙的自觉意识和成效卓著的实践,中西文化交流所提供的时代机遇,梁氏对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柢及其批判继承精神,进步哲学观的指导与梁氏传播近代进化论的贡献,等等。这就使作者能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名副其实地做到对梁氏学术作“当代解读”,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

再者,作者对研究工作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她在细绎大量文献、深入挖掘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梳理、归纳、提炼上,下了很大功夫。惟其如此,本书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诠释才有深度。如,关于“梁氏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探讨新史学范式”,论述了“对史学优良传统的阐释与褒扬”、“对历史编纂问题的总结与继承”、“发掘传统史学理论的永久价值”等问题。关于“梁启超多学科治史视野的前瞻性”,论述了

“心理史学方法的探研”、“历史统计学的倡导”、“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等。另外，对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审视、与鲁滨孙新史学的比较研究、欧游后梁启超新史学的发展态势等，同样做了深入的阐释和条理详备的论述。立意高、时代感强，抓住问题之荦荦大者，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确实把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当下发展21世纪的新史学很有启迪意义。

这里还要特别讲到，作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成果，是源于其发愤努力、刻苦钻研的精神。我不由得回忆起，当宋学勤同学考取博士研究生不久，我与她商定学位论文选题时的情景。当时，我有意让她做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题目，其中有一个考虑是因其此前写过梁启超新史学与鲁滨孙相比较的文章，可以以此为切入点。但同时，又担心题目难度太大，试想，梁氏论著达千余万字，其中多数与史学有关，再加上要研读与梁氏同时代人的相关著作，要阅读梁氏身后学术界对他研究和评论的大量论著，任务是多么艰巨，能够完成得了吗？我把选题的重要价值和极大的难度，都对她讲明了。不意学勤同学态度坚决，毫不犹豫，表示就以此作为选题。在以后的三个寒暑中，她确做到全力以赴，发奋攻关。科学探索是艰辛的，但她却在艰辛中发现很大的乐趣。当她读到梁氏一篇篇论著中闪光的思想和飞动的文采时，常常情不自禁要向同宿舍的同学推荐，高声朗诵起来。人们常用“苦读”、“攻读”来形容研读之难，但是确有一批人，以披沙拣金、探求新知为乐，以跋涉书山、探得新路，于前人的佳构中找到真理性的认识，寻找到智慧的滋养和审美的陶冶为乐，我想，这样的人是最有希望的！有更多的一批这样的人，学术研究才能绽开新花，民族文化才有继往开来，不断谱写出新的华章。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专家们一致予以充分的肯定。毕业之后，作者又认真加以补充、修改，使这部专著更臻新境。衷心地希望宋学勤博士今后能继续发扬在北师大求学时这种好学、苦读的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不断创造出新的佳绩！

2012年4月

目 录

导论	(1)
一 文献的检讨	(1)
二 研究的意义	(16)
第一章 梁启超新史学产生的本土因素	(22)
一 19 世纪末中外史学的交汇态势	(22)
二 新史学的酝酿	(29)
三 新史学的时代性	(33)
四 新史学的传承性	(45)
第二章 映照在梁启超新史学中的东学背景	(54)
一 戊戌前梁启超对日本明治文化的认同	(55)
二 日本文明史学的兴起	(61)
三 戊戌后对日本文明史学的体认	(64)
四 “梁启超式的输入”	(69)
第三章 欧游后梁启超新史学的发展态势	(82)
一 反省进化史观	(83)
二 反省历史因果律	(89)
三 走向英雄史观?	(95)
四 新史学的自省性与发展性	(100)

第四章 对旧史学的批判反思和对新史学范式的探讨	(106)
一 对史学优良传统的阐释与褒扬	(106)
二 对历史编纂问题的总结与推进	(118)
三 对传统史家疑古辨伪思想的检讨	(127)
四 发掘传统史学理论的“永久价值”	(132)
五 新史学范式的探索	(136)
第五章 梁启超多学科治史视野的前瞻性	(148)
一 “社会学者的眼光”	(151)
二 心理史学方法的探研	(167)
三 历史统计学的倡导	(177)
四 历史地理学的视角	(192)
第六章 梁启超新史学方法论的再审视	(206)
一 时代思潮与学术进路	(207)
二 “活的历史”与史学效用	(222)
三 视点创新与比较研究	(236)
四 科学观念与科学精神	(247)
第七章 全球视野下的梁启超新史学	(260)
一 与詹姆斯·鲁滨孙的“共振效应”	(260)
二 与马克·布洛赫的“不谋而合”	(270)
结语 百年之后当思我	(288)
一 梁启超新史学的范式意义	(289)
二 “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00)
附录 梁启超史学年表	(320)

导 论

一 文献的检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新史学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他在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提出了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命题，为后世留下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遗产。

鉴于梁启超的巨大影响，自1929年他去世至今，海内外学者从未停止过对他的研究。所以研究这个课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要研读数量庞大的各种类型的文献史料。主要包括四类：一是海内外学者研究梁启超的论著与资料；二是梁启超本人的史学论著，梁启超治学，虽以“百科全书式”称闻于世，但究其根基，实植于史学；三是要读一些梁启超读过的相关著作；四是还要读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国内学人的相关著述，以及差不多与之同时的国外学者的“新史学”论著。

现对海内外学者研究梁启超新史学的成果作一梳理，由于大陆与海外（包括港台地区）的研究并不是同步的，所以分别予以总结。

（一）大陆学者的研究

大陆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可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一是1929—1949年，二是1949—1979年，三是1979年至今。

1. 1929—1949年。在这二十年间，主要有两类文章：一是梁启超的

生前好友及学生写了一些纪念性质的文章，这些纪念性文章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渊源、提倡新史学和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整理中国学术遗产等有很多中肯评价；二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所撰写的论著，这一类对梁启超的批判较多。

1929年初，梁启超去世后，对他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就开始出现，其生前好友及学生撰写了纪念文章，由于他们有的与梁启超知交颇深，有的是跟随梁启超多年的学生，对梁启超的学品和人品都比较了解，其感受更直接，对梁启超把握得较深刻；又加之这些撰写者大多是名家，有较高的水平，见解比较高超，眼光较敏锐，所以真知灼见颇多，如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素痴（张荫麟）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郑师许的《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缪凤林的《悼梁卓如先生》以及张其昀的《悼梁任公先生》，等等。三四十年代也有学者对其学术活动进行研究，主要有克凡的《梁任公先生在我国近代史学上的贡献》，王采石的《梁启超之学术贡献》，王森然的《梁启超先生评传》，杨荣国的《梁启超的思想学术》等。现选择影响较大者作一评析。

郑振铎叙述了梁启超的生平与贡献，指出了他六个方面的成绩，其中第五方面即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努力”，同时还指出“梁启超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始终是一位历史家”。^①

张荫麟把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时期，指出每一个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其中第四期即为欧游归后，是专力治史时期。

吴其昌作为梁启超的弟子，于1944年著有《梁启超传》，由胜利出版社出版。此书作为较早问世的梁启超传记，对梁启超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脉络有所梳理，对于时代背景交代尤详，有其参考价值。但因作者去世，此书为未完成著作。该书现存三章，由夏晓虹重新整理，于2004年再版，分别题为“一世以来中国之命运”、“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以及“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王森然在其《梁启超先生评传》里，称梁启超为“绝代之文宗良师”、“当时全国学术界之灵魂”。^②

①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② 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4—25页。

梁漱溟的《纪念梁启超》一文，把梁启超与蔡元培相较，说其最伟大之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指出梁启超在学术上“感应敏捷，而能发皇于外，传达后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而久远”。并总结说：“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到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①

以上所述多属于纪念性的文章，从梁启超所取得的成就着眼，对其褒扬较多。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研究性的文章集中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如30年代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专章分析了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即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

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配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吴泽在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借批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败的命运，因此，书中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很少提及，所以对他的评价较低，基本是全盘否定。

2. 1949—1979年。这一时期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对梁启超的评价进一步集中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关注革命与改良，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梁启超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成为批判的对象。一些文章除了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作用外，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②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代表，他在戊戌时代提出的变法主张有进步作用，也有反动性的一面；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所提出的“新民”思想，前半部分歌颂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有进步作用，后半部分反对革命，放弃立宪，日趋反动。^③ 在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趋于冷寂，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文章也大多以否定为主，如《批

① 梁漱溟：《纪念梁启超》，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59—262页。

② 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2卷。

③ 冯友兰：《梁启超底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判梁启超的反动史学观点和方法》^①，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阶级属性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揭露。有的文章甚至在某些方面曲解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②

但在这种潮流下，也有清醒的学者如陈旭麓、蔡尚思、师宁等，对梁启超能有分析地介绍，有过一些中肯的评价，尽管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

蔡尚思撰写了四篇文章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③他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他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时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1915年《新青年》出世、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开始以前为第一时期，从此以后为第二时期。认为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地位，正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相反：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后期不如前期；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则前期不如后期。肯定了梁启超前期在政治上的进步地位。在批判其后期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同时，蔡尚思也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地位，是“清末头一个‘新史学家’”。

陈旭麓于1961年在《光明日报》上连连发文论述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能比较辩证地评价梁启超。指出梁启超变幻的表象虽多，却存在一个不变的实质，那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作为学问家的梁启超，也只是在史学方面有点成绩，特别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建立了一个体系。”^④到了新时期以后，陈旭麓对此进行反思，曾交代其文的写作背景：“记得当年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说梁启超思想变化的表征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戊戌政变后的梁启超已无改良主义思想之可言，只是全然的反动。因此，我连日撰写此论。由于当时的思想和认识，语多苛求，辩证思维较少，对梁启超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也未能给予应有的评价。”^⑤这段话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氛围。

① 《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② 李侃：《梁启超新史学思想试论》，《新建设》1963年第7期。

③ 《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文汇报》1961年3月31日；《论梁启超的旧传统思想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9月15日；《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④ 陈旭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7月25日。

⑤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还有师宁撰文指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的贡献是超越前人的。^①

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对梁启超新史学的评价不公，“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研究的主色调更形黯淡，不仅其政治立场、思想学说受到了猛烈批判，其人品和人格也遭株连。……对这样一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术活动及其伟大贡献，难免湮没在时代环境中”。^②

3. 1979 年至今。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国内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对梁启超的评价突破了原来的是非框架，研究领域也得以拓展，从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思想领域而扩展到学术文化思想领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对梁启超“不中不西”的学术也出现了研究热点。

率先对梁启超思想研究作出突破的是李泽厚《梁启超与王国维思想简论》^③一文，该文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所以将梁启超作为否定人物来对待和论述，是因为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党，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但作者认为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先进人物有许多应该批判的唯心思想，落后者也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不止是批判他的唯心主义或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全面衡量，给以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地位。”所以作者从这个角度和标准着眼，认为梁启超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文章从三个方面评价了梁启超：一是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应予肯定的人物，功大于过；二是梁启超广泛宣传了资本主义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起了反封建的进步作用，是影响最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三是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李泽厚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领域的重大贡献，称他“是最早在中国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他的史学观在当时是进步的，并将之与启蒙工作联系起来，“这是与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旧史学不相同

① 师宁：《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

② 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③ 《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史学观，它在当时是进步的。它的进步正在于它是当时整个启蒙思想与传统封建思想意识对立斗争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梁启超在本世纪（20世纪）初提出了与旧史学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史学观，也属于启蒙范围”。^① 李泽厚发思想解放之先声，在当时国内的学术界别开生面。

自此以后，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研究梁启超的专著不下数十部。与本课题有关的专著，依其内容侧重之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梁启超的传记与评传，另一类是论述梁启超学术思想方面的专著。另外，有关梁启超研究的论文不下400篇，其中有关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近百篇。

可以说，这些论著对梁启超的评价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由过去基本的全盘否定而趋向于基本肯定。以下作一分析。

（1）有关梁启超研究的传记与评传比较全面、客观地研究了梁启超的生平、政治和学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梁启超的传记和评传陆续出版。据笔者所统计，不下十几种。^②

1980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孟祥才著《梁启超传》一书。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完整地研究梁启超的传记，是新时期重新评价梁启超的可贵尝试。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由于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依然带有浓重的左倾色彩，表现出过渡性特征。但此书对新时期的梁启超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喜所、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分20章来论述，篇幅较大，以政治活动为经，以政治思想为纬，较好地反映了作为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的全貌。

①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页。

② 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刚：《梁启超》，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版；吴廷嘉、沈大德：《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董四礼：《晚清巨人传——梁启超》，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李平、杨柏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其泰：《梁启超评传——笔底波澜 石破天惊》，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勋敏、申一辛：《梁启超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罗检秋：《新会梁启超：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上述两本传记主要着眼点是从政治方面来研究梁启超。吴廷嘉、沈大德合著的《梁启超评传》、陈其泰《梁启超评传》与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则主要从学术思想方面为其立传。

陈其泰《梁启超评传》所着重的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成就的论述，是第一部着眼于梁启超新史学家身份为其作传的著作，并称梁启超“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作者把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时期：1895—1903年，是梁启超投身于变法运动和进行启蒙宣传的辉煌时期；1903—1914年，是梁启超一生中比较暗淡的11年，他先是以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身份，与革命派展开论战，违背历史潮流，后又与袁世凯关系密切；1915—1917年，梁启超在政治活动上再度有出色的表现，他组织护国运动，并作为这场保卫共和政体的正义战争的最高指挥者而名垂青史；1918年以后，是梁启超专心著述的10年。作者认为，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来说，梁启超一生中的戊戌前后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最值得关注。所以，对梁启超的历史地位的定位，也应该从这两方面来看，他既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此书的论述重点也着眼于梁启超爱国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启蒙的贡献，并认为，这些是梁启超在史学上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此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梁启超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后期（晚期著述）两个阶段，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以避免东抓西抓，据表相立论”。^①书中对梁启超代表性史学论著皆有精到的分析，诸如“《新史学》的划时代的意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势”、“论清学史的两部名著”、“多层面、多格调的先秦史研究”、“文化史开山之作”、“文献学领域的非凡建树”等等，全面、深入、客观地评价了梁启超的系列史学著述。最后，作者总结贯穿梁启超前后期史学论著的共同点为：一是站在时代高度，对传统史学作了总结，大力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二是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学术思想，构建了近代史学的理论体系，初步规划了近代史学的蓝图；三是恢弘渊博，涉及广泛的领域且成绩卓著。作者特别指出：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相

① 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前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交汇,才形成了梁启超新史学这一新的高峰。此书对本课题研究启发颇多。

(2) 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专著^①涉及各个学科领域,使梁启超研究的范围得到了较大的扩展,研究梁启超在多个学术领域里的贡献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研究在不同侧面的补充和丰富。

钟珍维、万发云著《梁启超思想研究》出版年代较早,是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研究。作者首先考察了梁启超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渊源,然后依次剖析了他的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法制、教育、科技、新闻和文学思想。这部专著涉及面很广,大体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全貌。但很多观点留有时代烙印,如批评梁启超不懂得历史唯物论等。

蒋广学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打通文、史、哲的壁垒,合各学科而治之,对梁启超的中国学术观作出历史的价值判断和时代的价值判断。其第十章“以佛治史 心归于佛——评梁启超的史学观”,不是一般的谈论梁启超新史学成就,而是紧紧围绕着梁启超对史学与佛学、儒学关系的阐明,讨论他的史学观问题。

此外,各种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②,对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有所探讨,在此不再一一论列。

(3) 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研究的论文涉及了梁启超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史学理论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及梁启超在学术史、历史文献学、人物传记等各种专史领域里的撰述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① 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董方奎编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宋仁主编:《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易新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刘邦富:《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梁启超的史学观与历史观。以梁启超的史学观与历史观为论题的论文颇多,据不完全统计在15篇以上,但低水平重复较多。对梁启超历史观、史学观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因为他多次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思想及人物个性的影响,所以有人称他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又因为他曾明确提出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也有人称他是进化史观论者;也有人说他是英雄史观论者,等等,不一而足。

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代表性的论文有胡逢祥的《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新探》^①和陈其泰的《梁启超在构建史学理论体系上的贡献》。^②胡逢祥从理论渊源、内部结构、体系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陈其泰认为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关于史学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二、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三、史学方法论——史料搜集与鉴别;四、史家修养;五、专史的做法。全面评论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另外,晋荣东撰有《李凯尔特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转型》,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所受李凯尔特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陈国庆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也作了一定的探讨。王健的《梁启超新史学认识论之探析》^③和言文的《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④则对梁启超的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探讨。刘晓华则撰文指出,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⑤比较史学方法曾为梁启超大力提倡和实践,王秀青撰文指出,梁启超极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多次阐述比较研究法的内涵与功用问题,促进了近代这一富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法的成型和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⑥

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梁启超的文献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诸书中。对之进行探讨的专篇论文有:吴春梅《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

① 《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

② 《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④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⑤ 《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⑥ 《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